

# 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sup>\*</sup>

張伯偉

## 提 要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東亞地區，是一個漢文化圈的所在。其中的一項重要標誌是，在這個文化圈中的知識人，都能够運用漢字進行著述和交流，並且以此為榮。當東亞各國的文人面對面交流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方式——筆談。“筆談”一詞，顧名思義就是用筆而不用舌、用文字而不用語言的交談。狹義的“筆談”，特指同文不同語的兩國或兩國以上人士會面之時，用書寫文字代替語言來進行溝通交流的一種方式。本文所要討論的，就屬於狹義的“筆談”，討論的時段下限是 20 世紀以前。文章著重回顧了筆談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狀況，並對其得失予以評騭，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強調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關鍵詞：東亞 文人 筆談 回顧 展望

## 一、前 言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東亞地區，是一個漢文化圈的所在。其中的一項重要

---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朝筆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4AZD078。在研究歷史回顧的寫作中，曾部分利用課題組鄭墀謨教授、徐毅教授收集的資料，特此致謝！

標誌是,在這個文化圈中的知識人,都能够運用漢字進行著述和交流,並且以此為榮。儘管在歷史上,東亞各國也曾先後有其自身的文字,但或稱“諺文”,或稱“假名”,在知識人看來,是鄉野之文,是女流之文,有的人甚至公然宣稱對本國文字“未習”或“不識”。新西蘭學者費希爾(S. R. Fischer)說:“漢語成了東亞的‘拉丁語’,對所有的文化產生了啓迪,其程度遠遠超過了拉丁語在西方的影響。”<sup>1</sup>

此處用到的“漢語”其實並不精確,只能說是“漢字”,因為同樣的漢字,在東亞各國都有其自身的發音,彼此之間是不能直接交流的。因此,當東亞各國的文人面對面交流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方式——筆談。<sup>2</sup> 這是“以筆代舌”,書寫下來的是漢字。透過對漢字的書寫和理解,彼此之間達成了思想和情感的交流。甚至在有翻譯在場的情況下,為了能够曲盡人意,也仍然採用筆談的方式。<sup>3</sup> 這種方式也引起了歐洲人的觀察和注意。比如有著“傳教聖徒”之稱的葡萄牙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父,他在1548年寫給印度總督加爾西亞·德·薩(Garcia de Sá)的報告中,曾援引一位商人描述日本的話,說他們“擁有關於這一切知識的巨著,都用漢語撰寫。除了漢語以外,他不知道還有用其他文字寫作閱讀的”;“從占婆到日本陸地的京都,人們都讀漢字書籍”。<sup>4</sup> 還是這位沙勿略神父,曾記錄了另一位葡萄牙商人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z)的觀察,日本的僧侶“他們都能够閱讀和書寫中國語,但卻不能說,所以都和中國人筆談,因為中國人也不會說日本話”。<sup>5</sup> 而沙勿略本人後來也有同樣的觀察:“雖然是相同的字,日本人讀時用日語,中國人讀時用中

1 費希爾著;李瑞林等譯:《閱讀的歷史》(上海: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93。

2 朝鮮李永:《日棧集略》,人卷《問答錄》,載與日本中村正直筆談云:“(中村):‘二十年前,就長崎譯官二三名就支那語,然與北京音夙別。……至今不能與清人談笑。特作寒暄數語耳,非筆談則不能。’我曰:‘音讀果與清國有異,然文字則既同,故我國無未解之歎矣。’”

3 朝鮮曹命采:《奉使日本時間見錄》七月初一日載:“聞馬州守入來,三使會坐於中火廳,與之相見。正使以譯舌之傳語謂有遺漏,而以筆談代之。”

4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著;王鎮英翻譯:《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十六世紀手稿》(澳門: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口:海南出版;北京:三環出版社,1998年),頁4。

5 這一資料的日譯本見岸野久著:《西歐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來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四章附,頁70。

文。雖然說話時互不能通，但書寫時僅憑文字便能相互理解。他們的口語不同，但字義相通，所以彼此能够理解。”<sup>6</sup> 他們所觀察到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用書寫漢字的方式溝通，就是所謂的“筆談”。

“筆談”一詞，顧名思義就是用筆而不用舌、用文字而不用語言的交談。廣義的筆談，包括所有用文字交流、溝通思想感情的方式，文人之間的詩文唱和，無論是處於同一場合，還是時空相隔，只要是使用文字往返，都可以說是“筆談”。但狹義的“筆談”，特指同文不同語的兩國或兩國以上人士會面之時，用書寫文字代替語言來進行溝通交流的一種方式。所以，本國人之間的文字交往、異國人之間不在同一場合下的文字交往，都不在狹義“筆談”的範圍內。本文所要討論的，就屬於狹義的“筆談”。

東亞筆談主要集中在中朝、中日、中越以及朝日之間，<sup>7</sup> 根據身份的不同，也可以大而別之為外交筆談、文人筆談和漂流民筆談。但古代的外交官也多由文官擔當，他們本來就是由文人出身，所以，寬泛地看，外交筆談也可以歸入文人筆談的範圍。筆談的歷史儘管到 20 世紀仍有延續，<sup>8</sup> 但整體上看已經式微，所以，本文討論的時段下限是 20 世紀以前。

## 二、筆談文獻的整理

以下略分中朝、中日、中越、朝日筆談，綜述其整理狀況：

### (一) 中朝筆談

中朝筆談主要見於學術界通稱的“燕行錄”中。朝鮮王朝建立以後，以“事大交鄰”為基本國策，所以每年都要多次向中國派遣使臣，這些使臣在往來途

6 河野純德譯：《沙勿略全書簡》（東京：平凡社，1985 年），頁 555。

7 現在也保存了少量其他國家人員之間的筆談，如越南人與朝鮮、琉球、日本、東南亞及歐洲人的筆談，朝鮮人與西洋人的筆談等，但數量極為有限，暫不涉及。

8 鄭子瑜：《詩論與詩紀·東游詩紀》記載 20 世紀 60 年代鈴木虎雄的贈詩，有“東京相見始交歡，以筆代言意自寬”之句。鄭子瑜：《詩論與詩紀》（香港：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55。

中或歸國之後，往往都有其使行記錄，在明代，這一類記錄多以“朝天錄”命名，到清代，則改為“燕行錄”。現在中外學者往往以“燕行錄”作為此類文獻的通稱，我認為是不合適的，較為妥當的名稱可以是“中國行紀”。<sup>9</sup> 本文涉及許多既有的研究整理工作，姑且隨此通稱。

最早的整理可以追溯至 1930 年，日本中村榮孝編纂了《事大紀行目錄》（載《青丘學叢》第一號）。20 世紀 60 年代初，成均館大學出版了《燕行錄選集》上下冊，收錄文獻三十種；1976 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今韓國古典翻譯院）選擇二十種燕行錄譯為韓文，並加索引，出版了《國譯燕行錄選集》十冊；2001 年，林基中編選了《燕行錄全集》一百冊，收錄約三百八十種文獻；同年又與日本夫馬進合作出版《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三冊，收錄文獻三十四種；2008 年，林基中又出版《燕行錄續集》五十冊，收錄文獻約一百七種；同年成均館大學也出版了《燕行錄選集補遺》三冊，收錄文獻二十種。以上共計五百七十餘種。2013 年，林基中出版光碟版《燕行錄叢刊》，2014 年又出版《增補燕行錄叢刊》，收錄文獻五百五十六種。這個數字就是目前已經公佈的相關文獻的大致數量。在海峽兩岸，臺灣珪庭出版社在 1978 年出版《朝天錄》四冊，收錄三十四種；復旦大學出版社從《燕行錄全集》、《燕行錄選集》和《燕行錄選集補遺》中選出了三十七種，在 2011 年出版《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從 2010 年起，也陸續出版《燕行錄全編》。目前的大型出版都是以影印方式進行，少數有點校整理者，都屬於單行本，以中國出版者而言，有《漂海錄》、《熱河日記》、《乾淨衙筆談》、《王朝間的對話》、《朝鮮文人李海應〈蔚山紀程〉細讀》等為數不多的幾種，韓國的情況也類似。

在中國出版的一些外交史料彙編中，也收入了一些中朝之間的筆談，如《近代朝鮮的開港》、《近代中韓關係史料選編》等。

---

9 參見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南國學術》，2015 年第 1 期，頁 76—89。

## (二) 中日筆談

中日筆談文獻的整理始於 1943 年實藤惠秀對《大河內文書》的抄錄整理。《大河內文書》是大河內輝聲(1848—1882)等日本人與中國駐日公使和文人之間的筆談,是現存中日筆談中卷帙最富的資料集。儘管他能够講漢語,卻自稱“不喜口談,惟以一枝筆換千萬無量語言”;<sup>10</sup>又有詩云:“不假辯官(通辯官魏梨門)三寸舌,只揮名士一枝毫。莫言東海幾蠻語,敘談通情何可勞。”<sup>11</sup>甚至形容與中國人筆談的感覺云:“弟之快樂卻勝於與嬋娟同房。”<sup>12</sup>因此,不僅筆談的數量多,而且還妥善保管,流傳至今。

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中,實藤惠秀將筆談遺稿的部分內容翻譯成日語,以《大河內文書》的名稱出版,<sup>13</sup>其後在鄭子瑜的協助下,共同出版了《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sup>14</sup>鄭子瑜後又修訂之,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sup>15</sup> 80 年代中期,汪向榮曾向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應設法複印全部“筆談遺稿”的資料,雖然撥出專款複印回來,但至今仍然束之高閣,無人問津。1980 年,日本東洋文庫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解題》,開始了目錄類的工作。1997 年,小島晉治監修之《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録集成》出版,收書 44 種,其中有不少含有筆談資料的內容。1999 年,李慶編注《東瀛遺墨》,收錄了近現代中日筆談書信資料二十九件。1999 年以後,小川恒男、信廣友江對於《宮島家文書·駐日公使等筆談》作了一系列譯注工作。而自 90 年代後期以來,陳捷發表了一系列整理和研究論著。劉玉才、印曉峰也整理了部分文人筆談資料。劉雨珍在前人工作基礎上,編成《清代首屆駐日公使

10 大河內輝聲:《大河內文書·戊寅筆話》,卷 25 第 101 話,載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20。

11 《大河內文書·戊寅筆話》,卷 3 第 25 話,同上書,頁 14。

12 《大河內文書·戊寅筆話》,卷 6 第 42 話,同上書,頁 54。

13 實藤惠秀翻譯:《大河內文書》(東京:平凡社,1964 年)。

14 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 年)。

15 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館員筆談資料彙編》，<sup>16</sup>是迄今為止收錄此類文獻最多的一種資料集。

中日筆談文獻整理的高潮雖然出現在 19 世紀後期，但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比如朱舜水的筆談，以臺灣大學徐興慶的收集整理工作最為完備。江戶時代漂流民的筆談資料，以日本關西大學大庭修、松浦章的收集整理為善。魏麗莎在 2011 年發表《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述略》，<sup>17</sup>可供按圖索驥之用。

### (三) 中越筆談

20 世紀的整理本僅一種，即陳荆和編注的阮述《往津日記》。<sup>18</sup> 較具規模的影印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的合作成果《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sup>19</sup>其中保存了不少中越人士的筆談資料。近年又有陳益源整理了李文馥《閩行詩話》中的筆談資料。<sup>20</sup>

### (四) 朝日筆談

朝日間的筆談文獻收集整理從《海行總載》開始，即始於 18 世紀中葉，當時只是彙聚此類文獻，這項工作始於洪啓禧之收集，徐命膺謄錄，趙曦編纂。<sup>21</sup> 日據朝鮮時期，朝鮮古書刊行會排印了《海行總載》四冊(1914)，作為“朝鮮群書大系”之一。內容是使行日本的日記，也含有不少朝日文人的筆談唱和。

16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7 魏麗莎：《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述略》，《文獻》，2011 年第 3 期，頁 144—150。

18 陳荆和：《往津日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

19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20 收入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21 關於今本《海行總載》的編者及篇目問題，學術界通常採用日本學者中村榮孝的意見，他認為今本的編者是成大中，其篇目少於趙氏《海槎日記》所列舉者，是因為在活版印刷時已散佚的緣故(見：《國史大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國史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卷 3，“かいこうそうさい 海行摠載”條)。我以為值得商榷，據元重舉《和國志》人卷“我朝通信”條云：“右通信條只錄送使年月與事之梗概，便略而不詳者，蓋各家《日錄》皆有該載，而寒井徐公命膺一皆謄書為《海門(行)總載》卷，而濟庵趙公曦方欲刪繁就要，編為一統卷。余且俟其成焉，姑存其大略如此耳。”可知今本《海行總載》的編者為趙曦，而篇目的多寡，則出於趙氏的“刪繁就要”。而今本的最後完成，將趙曦之《海槎日記》作為壓卷，則或當出於成大中之手。

1974 年到 1981 年之間，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今韓國古典翻譯院）出版了《國譯海行總載》十二冊，收錄的資料多於朝鮮古書刊行會的印本，將這些文獻翻譯成韓語，並加索引。河宇鳳的《重新發現的日本使行錄——與〈海行總載〉的補充相關》介紹了《海行總載》裏沒有收錄的通信使筆談資料。<sup>22</sup> 李元植出版《朝鮮通信使》一書，<sup>23</sup>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三十六種筆談唱和目錄。韓國史學會於 1991 年出版《朝鮮後期通信使和韓日交流史料：對馬島宗家資料》。

朝鮮通信使與日本文人的筆談資料，也引起日本學者的高度關注。1994 年，辛基秀、仲尾宏出版了《大系朝鮮通信使》八冊，<sup>24</sup>收錄相關文獻二十九種。高橋昌彥在 2007 年和 2009 年分兩次發表的《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錄稿》，<sup>25</sup>為學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收集此類資料最多的，是韓國鮮文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具智賢博士，她主持的《朝鮮後期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翻譯叢書》收錄並整理相關文獻約一百七十八種（以另一種方式統計是一百二十種），<sup>26</sup>目前已出版三十冊，收錄四十一種，並將陸續出版。

朝日筆談文獻在韓國和日本也有少數單行本形式的整理出版者，最近的成果是金文京等人校注的《萍遇錄》，<sup>27</sup>是以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所藏善本為底本整理的精品，值得關注。

### 三、整理中存在的問題

以上對東亞筆談文獻的整理工作略加綜述，其中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他

22 河宇鳳：《重新發現的日本使行錄——與〈海行總載〉的補充相關》，《歷史學報》，1986 年第 112 期。

23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首爾：民音社，1991 年）。

24 辛基秀、仲尾宏：《大系朝鮮通信使》（東京：明石書店，1994 年）。

25 高橋昌彥：《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錄稿（一）》，《福岡大學研究部論集》A 人文科學編，2007 年第 6 期卷 8，總 297 期，頁 17—35；高橋昌彥：《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錄稿（二）》，《福岡大學研究部論集》A 人文科學編，2009 年第 9 期卷 1，總 306 期，頁 21—40。

26 《朝鮮後期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翻譯叢書》（首爾：寶庫社，2013 年）。

27 金文京等：《萍遇錄》（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2013 年）。

們爲這一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爲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想著重談談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利於這項工作的開展。

### (一) 中朝筆談

中朝之間的筆談(特別是大量的文人筆談)主要收錄在學術界通稱的“燕行”文獻中,迄今爲止,對這一類文獻的整理,凡稍具規模者無一不是採用影印出版的方式。經過標點、校勘整理後的文獻,無論在韓國還是中國,都只有少數幾種,收書較多的是《國譯燕行錄選集》二十種。原書影印的好處是保存原貌,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向學術界公佈大量相關文獻。但從學術立場上看,這只能屬於收集保存而非研究。絕大部分的文獻未經解題,年代錯誤、作者錯誤、非燕行文獻的混入等等不一而足。在簡單整理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識讀不確、繫年有誤、作者歸屬不當等,也都有待於今後的更正和提高。

此外,“燕行錄”以外,還有大量筆談資料需要挖掘和整理。大致區分,略有四類:其一,單行本筆談集。如《清國問答》、《照會談草》、《皖友譚草》、《北洋衙門談草》、《北洋大臣衙門筆談》、《大清欽使筆談錄》、《北槎譚草》、《大陣譚草》、《燕槎譚草》等。其二,文集中的筆談。朝鮮方面如《燕臺瓊瓜錄》載金永爵與葉名禮、楊汀鷺、張丙炎等筆談(與《韓客詩存》所錄“金永爵筆談錄”完全不同);申錫愚《海藏集》收錄他與程恭壽、李心傳等筆談;徐贊奎《臨齋先生文集》收錄他與漂海清人筆談;徐澄修《明皋全集》收錄他與紀昀、劉松嵐等筆談;朴升東《漢江集》中有《瀛海筆談》;《大溪集》中有《北京筆話》;姜瑋《古懽堂未定草》收錄他與黃鈺談草等。此外,清人文集中也有少量筆談資料,如魏元樞《與我周旋集》收錄了他與尹顯東的筆談。其三,韓國史籍載錄的筆談。大量爲中國漂流民與朝鮮人的筆談記錄,如《同文彙考·漂民》、《備邊司謄錄》等;朝鮮漂流民與清人的筆談記錄見載於崔斗燦《乘槎錄》、朴思浩《心田稿·耽羅漂海錄》等。此外,如《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載李鼎運與阿肅筆談,《承政院日記》載朝鮮使者與林本裕筆談,《朝鮮外交關係書翰錄》載《筱帥談草謄本》,《劄移電存案》載《會坐談草》等,都屬於尚未整理的筆談文獻。其四,中朝文人交流詩牘集中的筆談。這主要指朝鮮文人在中國期間,與中國文人的



唱和書信等,如《燕杭詩牘》、《中朝學士書翰》、《尺牘藏弄集》、《金魯敬手札》、《玉河簡帖》、《海鄰尺素》等。此外,尚有一批珍貴圖錄,多為中朝文人的詩歌唱酬帖、尺牘、筆談等,以金正喜為例,如《金正喜與韓中墨緣》、《秋史資料的歸鄉》、“秋史書畫歸鄉展·藤塚鄰捐贈秋史資料展”、“藤塚鄰捐贈秋史資料展Ⅱ·秋史與韓中交流”、“藤塚鄰捐贈秋史資料展Ⅲ·藤塚鄰的秋史研究資料”、《觀看秋史的多種視角》等。

## (二) 中日筆談

目前已經整理的資料主要集中在漂流民筆談和外交筆談,前者主要由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的大庭修、松浦章等人整理,採用影印加解題的方式,提供了可資依賴的基礎;外交筆談和文人筆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到現在,經過實藤惠秀、鄭子瑜、李慶、陳捷、徐興慶、劉玉才、劉雨珍等人的努力,也整理出一批資料。其中外交筆談以劉雨珍《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規模較大,約占三分之二的內容是《大河內文書》。即便如此,中日筆談規模最大的《大河內文書》的全貌仍然沒有呈現出來,劉書第一編只是截取了其中“戊寅筆話”二十五卷、“己卯筆話”二卷和“庚辰筆話”十卷的內容,是在鄭子瑜基礎上的擴大,此外“羅源帖”十六卷、“丁丑筆話”七卷、“黍園筆話”十七卷、“韓人筆話”一卷、“書畫筆話”一卷皆未整理。另如楊守敬的《惺吾談屑》規模約五萬字,尙未公開發表。小島晉治監修的《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中華書局版“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中所收諸書,也含有不少筆談資料。因此,中日筆談文獻的全貌尙未有一個整體呈現,有待繼續努力。

## (三) 中越筆談

這一方面的文獻基礎更爲薄弱,已有的大型成果惟復旦大學出版社影印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收書七十九種。這是在世界範圍內首次公佈如此規模的越南北使文獻,意義重大。但限於種種主客觀條件,此書尙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版本的選擇不精(如《奉使燕臺總歌》以漢喃研究院抄本爲底本,未使用越南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作者的歸屬有誤(如將《旅行吟集》作者之一

馮克寬定為惟一作者)、解題的說明不確等。除此以外,尚有一些重要的遺漏,比如收藏在越南其他圖書館及法國、日本的圖書機構中的文獻,皆有必要作充實修訂,近年陳正宏教授、陳益源教授、劉玉琚教授都在從事補苴罅漏的工作。而經過整理的含中越筆談的資料僅有陳荆和校點之《往津日記》以及陳益源整理的李文馥《閩行詩話》中的部分內容,所以還存在不少文獻整理工作有待進行。

#### (四) 朝日筆談

這一方面的文獻總量與已經公佈的相比,同樣顯得薄弱。朝日筆談文獻以單獨成書者統計,約有二百五十種(計算方式不同或有出入),而目前已經公佈的約四十種,無論是在日本還是韓國。日本方面規模最大的屬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1994),韓國方面早年有《海行總載》(1914),近年有具智賢等編《朝鮮後期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翻譯叢書》(2013)。具智賢書含國譯、解題、點校、影印,已出版三輯約四十一種,並將在近年內完成一百七十八種(按照我們的統計方式約一百二十種)的出版工作,雖然起步較晚,但已顯示了其學術規模。但散見於朝鮮人的各種《海槎錄》、《東游錄》中的筆談文獻,尚未得到統計和整理。已經整理的一百二十種之外,至少還有一百多種專書尚未收集整理。無論是其全貌還是整理的數量,都遠遠不夠。而能夠做到類似金文京等人整理的《萍遇錄》,更屬鳳毛麟角。

從整體上看,現有的東亞筆談文獻整理之不足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文獻的不完整,無論是中朝、中日、中越、朝日筆談資料,儘管其呈現的完整度不一,但總的來說,都不能以整體面貌呈現,更不要說是系統的東亞筆談文獻全貌;二是整理工作的不理想,以影印居多,校點、校注者少。整理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影印本的解題在諸書年代、作者、版本陳述上的種種失誤。<sup>28</sup> 如何採用

28 以林基中編纂的《燕行錄全集》為例,就有一些學者對其中的問題予以更正,如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2003年第42號,頁127—238;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輯,頁37—65;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載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編:《中國學論叢》,2008年第24輯。

嚴格的文獻學方法，利用解題、標點、校勘、索引等一系列手段，將東亞筆談文獻作一個完整系統之呈現，正是今後應該努力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如果能夠繼續建設網絡平臺，讓更多學者能夠從中受益，必將大大促進這一領域的研究。

## 四、筆談文獻的研究

這裏也分國別逐一綜述。

### (一) 中朝筆談

在中朝筆談的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較早成果是日本學者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sup>29</sup>雖然遲至 1975 年出版，實際上是以作者 1936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改題刊行。該書利用了大量第一手朝鮮燕行文獻（包括筆談文獻），將嘉慶、道光以下清朝學風對朝鮮學壇的影響作了細緻勾勒，初次展示了這一資料寶藏的魅力。韓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較系統的研究有金泰俊的《洪大容與其所處的時代》<sup>30</sup>以及蘇在英的《旅行和體驗的文學：中國篇》。<sup>31</sup>至 21 世紀以來，還出現了三十多篇相關的博士論文，如朴香蘭《燕行錄所載筆談的研究：以洪大容、朴趾源為中心》（仁荷大學校，2010 年），千金梅《18—19 世紀朝清文人交流尺牘研究》（延世大學校，2011 年），對燕行錄所載筆談及與清朝文人間往來信函作了深入具體的分析和研究。但多數研究還是圍繞某書或某次筆談展開，如 정훈식《〈乾淨術筆談〉和使行文學的轉換》、<sup>32</sup>權政媛《朝鮮後期韓中文化交流之一樣態：以筆談為中心》、<sup>33</sup>李學堂《燕巖〈熱河

29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年）。

30 金泰俊：《洪大容與其所處的時代》（首爾：一志社，1982 年）。

31 蘇在英：《旅行和體驗的文學：中國篇》（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5 年）。

32 정훈식：《〈乾淨術筆談〉和使行文學的轉換》，《배달말》，2002 年第 31 期。

33 權政媛：《朝鮮後期韓中文化交流之一樣態：以筆談為中心》，《漢字漢文教育》，2003 年第 11 期。

日記》筆談內容的考察》、<sup>34</sup>朴香蘭《〈熱河日記〉筆談中捕捉到的清朝文人的形象和意義》、<sup>35</sup>김철《通過〈筆談〉看申翠微和清代文人交流的樣態及學術傾向》、<sup>36</sup>마츠우라아키라《近世東亞海域中國船的漂着筆談記錄》、<sup>37</sup>송원찬《清代韓中文人交流和文字獄——以〈乾淨衙會友錄〉為中心》、<sup>38</sup>오인택《崔溥〈漂海錄〉中出現的筆談》等。<sup>39</sup> 很明顯,進入 21 世紀後,相關論著的數量激增,形成了研究熱點。

中國學者較早利用燕行筆談資料進行研究的是張存武,1992 年他發表《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sup>40</sup>在更早出版的《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sup>41</sup>和《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中,<sup>42</sup>他已經大量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21 世紀以來,相關的專書和博士論文大量出現,形成了一個研究高潮,如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sup>43</sup>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等。<sup>44</sup> 而一些綜合研究也很值得注意,如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sup>45</sup>《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sup>46</sup> 對文獻的考訂也是值得重視的成果,如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最值得表彰的是夫馬進,他對於閔鼎重、申在植、洪大容與清朝

34 李學堂:《燕巖〈熱河日記〉筆談內容的考察》,《亞細亞文化研究》,2008 年第 15 期。

35 朴香蘭:《〈熱河日記〉筆談中捕捉到的清朝文人的形象和意義》,《東方漢文學》,2009 年第 39 期。

36 김철:《通過〈筆談〉看申翠微和清代文人交流的樣態及學術傾向》,《亞細亞文化研究》,2009 年第 16 期。

37 마츠우라아키라:《近世東亞海域中國船的漂着筆談記錄》,《東亞細亞文化研究》,2009 年第 45 期。

38 송원찬:《清代韓中文人交流和文字獄——以〈乾淨衙會友錄〉為中心》,《東亞細亞文化研究》,2010 年第 46 期。

39 오인택:《崔溥〈漂海錄〉中出現的筆談》,《역사와세계》,2013 年第 44 期。

40 張存武:《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載入崔永禧先生華甲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韓國史學論叢》(首爾:探求堂,1992 年)。

41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年)。

42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43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4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年)。

45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46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文士筆談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此外,松浦章對於漂流民的筆談研究也同樣值得注意,如《朝鮮國漂着中國船の筆談記録にみる諸相》(2014)。

## (二) 中日筆談

實藤惠秀於1964年出版的《大河内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標誌著中日筆談研究的開端。此後沉寂了三十多年,至20世紀90年代後期又重新開始,如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sup>47</sup>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sup>48</sup>期刊論文也集中在外交官和文人的筆談研究。中文研究論著特別要舉出伊原澤周將他自90年代以來發表的二十三篇論文集結出版,題名《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爲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sup>49</sup>陳捷的《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sup>50</sup>收入了六篇專門研究中日筆談的論文;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sup>51</sup>張升餘《明清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也辟專章討論各種不同階層的筆談。<sup>52</sup>中國學者的研究,除了上述外交人員的筆談外,另一個重點是關於岡千仞,如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sup>53</sup>又有兩篇碩士論文專門研討,如朱寒《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sup>54</sup>葉楊曦《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sup>55</sup>晚清以前的筆談也有學者涉及,如劉玉

47 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年)。

48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49 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爲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50 陳捷:《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51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52 張升餘:《明清時期中日文化交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53 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6期。

54 朱寒:《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55 葉楊曦:《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才《清初渡海移民與中日文化認知——以〈張斐筆語〉、〈霞池省庵手簡〉爲中心》。<sup>56</sup>

### (三) 中越筆談

目前只有少量的研究關注到中越筆談,研究者主要是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sup>57</sup>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sup>58</sup>這兩年則開始出現一些學術新人,如張京華《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爲中心》、<sup>59</sup>周亮《清代越南燕行文獻研究》等,<sup>60</sup>顯示了值得注意的學術活力。

### (四) 朝日筆談

利用朝日筆談從事研究,早自 20 世紀 20 年代就由日本學者開始,如松田甲《日鮮史話》、<sup>61</sup>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之研究》、<sup>62</sup>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之研究》、<sup>63</sup>田中健夫《中世海外交涉史之研究》、<sup>64</sup>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關係史之研究》。<sup>65</sup> 90 年代開始,以辛基秀、仲尾宏爲代表,開展了對朝鮮通信使資料的收集與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論著。21 世紀以來,夫馬進將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結合起來研究,出版了《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sup>66</sup>引人矚目。韓國方面,自 1991 年李元植出版《朝鮮通信使》以來,研究勢頭發展迅猛,韓國文學會 1996 年編纂了《朝鮮後期通信使的日本文

---

56 劉玉才:《清初渡海移民與中日文化認知——以〈張斐筆語〉、〈霞池省庵手簡〉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 期,第 47 卷。

57 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58 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9 張京華:《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爲中心》,《外國文學評論》,2012 年第 1 期,頁 5—44。

60 周亮:《清代越南燕行文獻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61 松田甲:《日鮮史話》(首爾:朝鮮總督府,1926 年)。

62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之研究》(首爾:朝鮮總督府,1926 年)。

63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之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上冊 1965 年、下冊 1969 年)。

64 田中健夫:《中世海外交涉史之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 年)。

65 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關係史之研究》(東京:文獻出版社,1986 年)。

66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學認識》、《癸未通信使行記錄的主題選擇》；此外，如李慧淳《朝鮮通信使的文學》、<sup>67</sup>韓泰文《李彥瑱的文學觀和通信使的世界認識》、<sup>68</sup>姜在彥《朝鮮通信使的日本見聞錄》，<sup>69</sup>具智賢的《癸未通信使使行文學研究》等專門研究著作中，<sup>70</sup>使用了大量的新發掘的朝日筆談資料，使這一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突破。2011年，寶庫社推出了一套研究叢書，收錄有具智賢《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的世界》、김형태《通信使醫學關係筆談唱和集研究》、許敬震等《通信使筆談唱和集文化研究》、초가남《通信使筆談唱和集文學研究》。相對來說，日本的研究偏重歷史，而韓國偏重文學。其後，趙奎翼等爲了方便研究者的使用，收集了與通信使相關的研究論文，編輯出版了《朝鮮通信使使行錄研究叢書》全13卷，<sup>71</sup>區分爲文學(1—3卷)；外交(4—6卷)；歷史(7—8卷)；文化、繪畫(9—10卷)；思想、意識、經濟、貿易、民俗(11卷)；食品、船舶、技藝、其他(12卷)；最末一卷爲路程踏查、記錄寫真篇，全面地集中展示了韓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成爲今後研究的新起點。

## 五、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研究論著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對筆談文獻的專門研究，另一類是綜合運用各類文獻(包括筆談文獻)的研究，後者的研究業績高於前者。

### (一) 專門研究

其中又可分爲兩類：一是對某種或某家筆談文獻的研究，中朝筆談往往集中在對“北學派”(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尚迪等)的研究，如 정훈식《乾淨衎筆談和使行文學的轉換》，朴香蘭的《燕行錄所載筆談之研究：以洪大容、朴趾源

67 李慧淳：《朝鮮通信使的文學》(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6年)。

68 韓泰文：《李彥瑱的文學觀和通信使的世界認識》(釜山：釜山大學校國語國文科，1997年)。

69 姜在彥：《朝鮮通信使的日本見聞錄》(한길사, 2005年)。

70 具智賢：《癸未通信使使行文學研究》(首爾：寶庫社，2006年)。

71 趙奎翼：《朝鮮通信使使行錄研究叢書》(首爾：學古房，2008年)。

爲中心》；中日筆談則集中在晚清的公使文人(如黃遵憲、楊守敬、黎庶昌、岡千仞等),如滝沢誠《榎藤成卿と章炳麟の交遊——筆談録をめぐる》、陳捷《楊守敬と宮島誠一郎の筆談録》、野元竜太《盛宣懷と岡千仞の筆談について》、王曉秋《近代中日筆談的形態研究:以〈大河内文書〉爲中心》；朝日筆談如金泰俊的《18世紀韓日文化交流的樣態:以〈江關筆談〉爲中心》、金聖鎮的《南玉的生涯和日本筆談唱和》,金仙熙《十七世紀初期至中期日朝知識人の他者像:林羅山と朝鮮通信使の筆談によせて》、小川和也《天和度朝鮮通信使と大老、堀田正俊の“筆談唱和”》等；中越筆談研究較少,如陳益源《越南李文馥與臺灣蔡廷蘭的詩緣交錯》、王志強《從越南漢籍〈往津日記〉看晚清中越文化交流》等。單一研究的長處是對於某種筆談文獻有較爲全面的探討和細緻的說明,少數文章也能够以小見大,但較多的論文往往受限於“見樹不見林”的狹隘視野中。二是概論性的研究,這方面在近年以王勇撰寫較多,如《明代東亞筆談文獻研究》、《燕行使筆談文獻概述》、《東亞漢文筆談研究》等論著,其好處是能够描繪出筆談文獻的總體框架,較爲全面。但總體看來,偏重以平面描述和綜合他人意見爲主。

## (二) 綜合研究

這一類研究儘管數量不多,但在學術上的意義頗大。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有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2014);在歷史研究方面,有李元植《朝鮮通信使》、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2012);在文學研究方面,有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2007)、《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2011)。無論研究視域、資料採擷還是問題意識、思想方法,這些著作都展示了迷人的魅力,也代表了今後研究的方向。

## 六、東亞筆談研究展望

所謂“東亞筆談”,主要指的是20世紀以前東亞漢文化圈內,各個不同國



家和地區的人士相見，雖然語言不通，卻擁有共同的對漢字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便以漢字作為溝通彼此的媒介，以筆代舌，相互交談。高麗末期權近《送日本釋大有還國》云：“情懷每向詩篇寫，言語須憑象譯通。”<sup>72</sup>江戶時期石川貞《呈朝鮮國副使書記元玄川》云：“不愁相值方言異，清興熟時揮彩毫。”<sup>73</sup>越南黎朝使臣馮克寬《答朝鮮國使李晔光》云：“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sup>74</sup>日本學者中村榮孝在《日鮮關係史研究》中也指出：“在外交場合以漢文唱酬筆談，乃中國文化圈的同文諸國間習慣化的國際禮儀。”<sup>75</sup>從 19 世紀末開始，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漢文化地位在東亞地區迅速墜落，但在中國周邊的各國各地區，至今仍存留著大量的筆談文獻，包括中朝、中日、中越、朝日之間。21 世紀初以來，這些文獻越來越受到東亞各國學者的重視，但也還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間。

“筆談”首先是“談”，“筆”是“談”得以進行的媒介和手段，20 世紀前的東亞人，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用漢語筆談進行順暢交流。對當時的知識人來說，漢字不僅是作為交際工具，更是作為知識人身份得以建立的文化標準而存在，所以，在東亞各國，漢字可以有不同讀法，但其書寫、語意的表達則基本一致，這是東亞筆談可以開展的原因，是域外人可以創作漢籍的原因，是東亞漢文化圈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現在“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研究得以展開和應該如此展開的原因。但強調漢文化圈的存在，並不否定東亞國家、族群因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目標不同而出現衝突，也不否認東亞各國、各族群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上的不盡相同，對漢籍文獻的選擇和理解不盡相同，利用漢籍文獻的時間、種類、在國家和社會建構中的作用不盡相同，而是將漢文化圈作為一個大的思考框架，以之觀照東亞各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交流互動，從東亞飽滿的文化共性中看各國豐富的文化個性，也從他人的觀照中把握自我。

72 權近：《陽村集》，卷 2，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 年），第 7 冊，頁 28。

73 伊藤維典編：《問槎餘響》（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卷上。

74 裴輝壁：《皇越詩選》（越南漢喃研究院藏），卷 5。

75 中村榮孝：《朝鮮の日本通信使と大阪》，《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年），頁 344。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學術界有識之士已呼籲關注域外漢籍，如今大量域外漢籍作為歷史資料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同時對思想有興趣的研究者也投身其中，使這一研究成為有思想的學術領域，其重要特點是力圖擺脫以國別文學和中韓、中日、中越交流史為中心的研究視野，擺脫以歷史史料為中心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更宏觀、更全局性的問題。

文學活動是人的活動，東亞筆談文獻的特徵是能夠將文人交往的歷史實況重現眼前，將紙上的文字化作人際交往的展開，使今人獲得一幕幕生動的文學場景。但人與人的交往常常是個別的活動，其資料也可以說屬一枝一葉，當我們將研究領地擴展到這些前人未多注意之處，一方面固然會使我們對於過去獲得更為豐富的知識和理解，然而其代價很可能就是“碎片化”。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就必須將問題置於漢文化圈的整體背景，探索其間或隱或顯的關係。這就有必要以“漢文化圈”為方法，這是將研究對象與思維方式的契合，使不同領域和學科能夠得到貫通和整合。

“筆談”是東亞漢文化圈中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筆談”文獻是對筆談的記錄，其中很多筆談記錄散佈在筆談者的游記之中，為筆談提供了可確定的時間、地點、場景、情境，甚至筆談者對筆談對方和筆談內容的看法，所以“筆談”文獻具有田野調查報告的意味，可對之進行知識考古學式的研究。而且每次筆談必有發起者，發起者對筆談對象會有所選擇，發起人的提問方式、期待視野，對談時的情境走向，筆談結束後，筆談記錄的歸屬者，都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可對之進行社會學的研究。“筆談”文獻是一種特殊的文獻，其作者一定是跨國界的，他們圍繞一件事情展開交談，實際提供了從周邊看中國、東亞其他各國理解中國的方式，也提供了中國古代人看東亞其他各國的方式，可借此落實“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視角。具體到筆談文獻內容，可謂進寶山、入武庫，舉凡政治、經濟、法律、思想、倫理、教育、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博物、農業、醫學、環境、風俗等都有豐富的材料，可據此展開各種專題研究。

以下略舉例以明之。

例(1)：《雞林唱和集》載朝鮮肅宗三十七年(日本正德元年,1711)通信使正使書記洪舜衍(號鏡湖)妾安媛作《春思》：“寶篆香銷欲曙天，忽聞啼鳥

到窗前。沙頭夜過何山雨，柳外朝生極浦烟。別恨自憐花影亂，春愁暗與倆伎邊。瑤琴彈罷江南曲，曲曲離鸞又採蓮。”<sup>76</sup>又《閨恨》：“十五嫁游子，二十猶未歸。縱欲道心事，與須相見稀。”日本瀨尾維賢（號用拙齋）跋曰：“右洪鏡湖妾安氏之詩，事雖不關唱酬，而清思妍語，可與李易安、朱淑真相伯仲矣。一友人得之鏡湖席上，愛玩示予。嗚呼！三韓婦人能言詩，亦可見其文華之盛，故錄。用拙齋誌。”《兩東唱和後錄·別錄》為他人所編，此二詩亦見錄其中。

從文獻學角度看，這兩首朝鮮女性作品不見於其他資料，可作補遺。但從用拙齋的跋文中可見，此詩是在唱和席上由洪鏡湖顯擺出來的。日本自古不限制女子寫作，從平安時代開始，就有很多女性擅長為文，不僅包括日語文學，如《源氏物語》，也包括漢文學，如《經國集》卷14錄公主有智子內親王的《雜言奉和漁家二首》，就是摹仿張志和的《漁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評之為“本朝女中無雙秀才”。到江戶時代，能詩女性更多。朝鮮通信使赴日，本來就含有“文戰”的因素在，所以，洪鏡湖顯示其愛妾律絕兩首，無非是要表現朝鮮在這一方面也不落後。事實上，他也收到了這樣的效果，用拙齋評為“可與李易安、朱淑真相伯仲”，並且從中生發出“三韓婦人能言詩，亦可見其文華之盛”的感歎。

如果把這個例子與洪大容在中國談論的話題比較一下，就會饒有趣味。洪大容於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中國，在北京與潘庭筠（蘭公）、嚴誠等人見面筆談云：

蘭公曰：“東方婦人有能詩乎？”余曰：“我國婦人，惟以諺文通訊，未嘗使之讀書。況詩非婦人之所宜，雖或有之，內而不出。”蘭公曰：“中國亦少，而或有之，仰之若慶星景雲。”……余曰：“君子好逑，琴瑟和鳴，樂則樂矣，比之慶星景雲，則過矣。”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筠之妹，以能詩

76 瀨尾維賢編：《雞林唱和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坊玉芝堂刊本，正德辛卯（1711）版。

入於中國詩選。”余曰：“女紅之餘，傍通書史，服習女誡，行修閨範，是乃婦女事。若修飾文藻，以詩得名，終非正道耳。”<sup>77</sup>

這裏提到了許蘭雪軒，是朝鮮時代最有名的女詩人，在中國影響也很大。為何洪大容不引以為榮呢？因為蘭雪軒的詩曾遭柳如是的揭露，認為存在大量抄襲之作，有些朝鮮士大夫頗以為羞。這就是場合不同，對於類似的話題就引出了不同的結果。

例(2)，《問槎餘響》載日本金谷雄江《稟秋月龍淵玄川》云：

吾邦文物日聞，俊傑日起，且太平日久，海內富溢也。唐山賈人貿易肥長崎者無虛歲矣，以故珍奇之書往往傳播吾邦，是以吾邦之人亦學識大逾越乎前代云。<sup>78</sup>

這則資料，涉及書籍傳播以及日本的文化進步。這是甲申年(1764)朝鮮通信使團在日本的筆談記錄，秋月為南玉號，龍淵為成大中號，玄川為元重舉號，三人皆掌文事者。此年在漢文學史上是非常關鍵的一年，<sup>79</sup>總體來說，是朝鮮文人對日本的文化進步刮目相看，並且獲悉其進步之原因，乃在於大量而不間斷地將清代書籍傳入長崎。而朝鮮則自明清鼎革以後，蔑視清朝文化，使臣入清，所購者多宋明之書。《雞林唱和集》卷7記載1711年藤原子績(號菊叢)與朝鮮製述官李磻(號東郭)的筆談如下：

(菊叢)問：“康熙年中，中華連陽廖文英所輯《正字通》，商舶載來，流傳本邦。辯論詳悉，舉字靡遺，甚便檢閱，省載酒之勞。貴邦亦有之乎？”

77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冊，頁136。

78 伊藤維典編：《問槎餘響》(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日本平安書林，明和元年(1764)九月版。

79 參見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文學遺產》，2008年第1期，頁114—131。

(東郭)答：“皇明革正之後，中國文華掃地盡矣，我國使价之往來，元無購買文籍之事，故廖文英所撰之書，不曾見之。而即今中國亦多有如此等書，不足貴也。”

但是在 1764 年之後，朝鮮文人從日本的文化進步中受到刺激，紛紛認識到其進步與清朝文化輸入的關係，並且成爲一代人的通識。元重舉《和國志》“詩文之人”條云：“其後混竅日鑿，而長崎之書遂通見。”<sup>80</sup>李德懋《蜻蛉國志》“藝文”云：“近者江南書籍，輻湊於長崎，家家讀書，人人操觚，夷風漸變。”<sup>81</sup>又《天涯知交書·筆談》云：“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書畫、書籍、藥材，輻湊於長崎，日本兼葭堂主人木世肅，藏秘書三萬卷，且多交中國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國之可比。”<sup>82</sup>柳得恭《古芸堂筆記》卷 5“我書傳於倭”條云：“倭子慧竅日開，非復舊時之倭。蓋緣長崎海舶委輸江南書籍故也。”<sup>83</sup>稍後的金正喜《雜識》云：“今見東都人篠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舛陋僻謬之習，詞采煥發，又不用滄溟文格，雖中國作手，無以加之。噫！長崎之舶，日與中國呼吸相注，絲銅貿遷尙屬第二，天下書籍無不海輸山運。”<sup>84</sup>又李尙迪《讀〈蔦錄〉》云：“近來中國書籍，一脫梓手，雲輸商舶。東都西京之間，人文蔚然，愈往而愈興者，賴有此一路耳。”<sup>85</sup>把這些內容結合起來，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連串內在關係。

例(3)，《問槎餘響》卷上又記載金谷雄江與成大中(龍淵)的筆談：

金谷問：“嘗聞貴國之人讀書有回還之讀，願以貴國之讀法讀之。”龍淵答：“民間有此讀，士林不貴之。”金谷稟：“聞貴國之諺文，自世宗莊憲王

80 元重舉：《和國志》(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地卷，頁 326。

81 李德懋：《雪莊館全書》，卷 64，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259 冊，頁 162。

82 同上，卷 63，頁 131。

83 柳得恭：《雪岫外史》外二種，(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頁 125。

84 金正喜：《阮堂全集》，卷 8，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301 冊，頁 147。

85 李尙迪：《恩誦堂集》續集，“文”卷 2，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312 冊，頁 242。

始,今記諺文者,字樣扁畫,恐當有誤寫,敢請改正之。”龍淵問:“何人書之?”金谷答:“大湫所書,即僕師也。遂不卒業。”

又記載田勝山與成大中筆談:“勝山稟:‘貴邦諺文,未審字體,幸見示。’龍淵答:‘諺文未暇書示,字多故耳。僕輩今當發行,不得穩討,可恨。’”在朝日筆談中,日方多次要求朝鮮人把諺文寫給他們看,但朝鮮人總是百般推託。在《桑韓筆語》中,我們看到,最終日本人是從朝鮮使團的下人處見得諺文。山田正珍(號圖南)“與學士之僕筆語”條記載道:“稟(圖南):‘爲余書諺文。’復:‘諾。’”<sup>86</sup>以下就寫了 152 個諺文。又有用諺文所寫日語五十音。又有“戲聞漢字之韓音”條,大概可以滿足其好奇心。

這是一個和語言學相關的問題,朝鮮文士何以推託書寫諺文?這是因爲漢文在當時是一種高貴的、正統的、文雅的身份的象徵,而諺文則不免是粗鄙的、鄉野的、女性的象徵。當時的朝鮮知識人,很多是拒絕學習諺文或推託不懂諺文的。理學家宋浚吉發現《家禮諺解》一書中有很多錯誤,想求教於父親,但他的父親“未習諺字,不能一一看過”。<sup>87</sup>朴世采說自己“不識諺字”,<sup>88</sup>他也是一個理學家。再如漢文學造詣極高的文人朴趾源,他公然宣稱:“吾之平生,不識一個諺字。”<sup>89</sup>少數知識女性學會了漢字,能够使用兩種文字,但仍然分別高下。安東張氏 1668 年給其子李徽逸一封信之末云:“諺書不見信,書此以送。”<sup>90</sup>意思是“用諺文寫給你恐怕不會受到重視,所以用漢字寫了這封信送你”。其玄孫李象靖在跋中說:“夫人以諺書不見信,故手書此以與之,其憂疾

86 山田正珍編:《桑韓筆語》(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日本東都書肆,寶曆十四年甲申(1764)四月版。

87 宋浚吉:《同春堂集》別集,卷4,《上慎獨齋先生》,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07冊,頁362。

88 朴世采:《南溪集》外集,《答尹子仁》,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41冊,頁317。

89 朴趾源:《燕巖集》,卷3,《答族孫弘壽書》,載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頁78。

90 《貞夫人安東張氏實記》,載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頁273。

之慮、勉學之意，爛然於一紙。”<sup>91</sup>談論嚴肅、重大的問題就使用漢字。在日本人面前，朝鮮知識人要保持其自尊和體面，所以絕不肯輕易書寫諺文。至於下層僕役則沒有這種身份感，所以想寫就寫了。

當然，我們在使用筆談類文獻時也需要注意，因為出於倉促應對，有時說話是門面語、應酬語或一時興到語，不可作死於句下的理解。有的時候，筆談內容還不免有誤。比如《桑韓唱酬集》卷1記載日僧圓贊與張弼文（菊溪）的筆談，張回答日僧有關崔致遠之問時說：“崔致遠字孤雲，崔沖之子，新羅末葉人。”<sup>92</sup>崔沖是高麗時代首創私學的人，晚於崔致遠約一百三十年，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至於在筆談中為爭面子而誇大其辭的言論，更是不能坐實理解。

東亞筆談文獻是域外漢籍中的一個分支，而且與東亞文人間的詩文唱和、信札尺牘、序跋評點有著密切關係，如果作單獨研究，往往陷於“見樹不見林”甚至“一葉障目”的泥沼。而將筆談文獻置於東亞漢文化圈的語境中，就能全面觀照東亞知識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20世紀以前的東亞社會，除了中朝、中越、中琉之間存在著官方的朝貢關係之外，從官方到民間，東亞知識人之間還存著一個巨大的、多元的、交錯的交流渠道，即筆談。儘管筆談的主角有外交人員、文人學士以及漂流民，但主要還是在當時東亞的知識人之間完成的。由於漢字是東亞諸國的“共同語”，這就類似古典時代以後的近代早期，歐洲廣大地區的學者使用拉丁語相互通信，從而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歸屬感”，認為自己屬於一個被他們稱作“文人共和國”或“知識共和國”的國際共同體，以漢字為媒介和工具，在東亞長期存在著一個知識和文化的“共同體”，有人遂將它稱作“文藝共和國”。<sup>93</sup>筆談文獻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共同體”的產物。如果說，研究方法（思維和路徑）是研究對象的“對應物”，那麼，“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提出與實踐，與這一研究對象是契合無間的。另一方面，筆談文獻雖然產生於一個“文人共和國”，但其中的聲音並不單一，而是“複調的”、“眾聲喧嘩”的，甚至含有文化上的較量。因此，不能僅僅將筆談文獻放在單一的國別外交

91 同上注。

92 河間正胤編：《桑韓唱酬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享保五年庚子（1720）九月版。

93 參見高橋博巳：《東亞の文芸共和國》（東京：新典社，2009年）。

史領域中考察,必須放在整個東亞社群的視域中,放在漢文化圈整體的內在關聯下考察。只有從東亞文化的整體性出發,纔能在朝貢體制之外,思考另一個更加多元與開放的東亞社會,在關注“統一性”的同時,不致於忽略其“多樣性”。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

#### (一) 專書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張升餘：《明清時期中日文化交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

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

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陳荆和：《往津日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陳捷：《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費希爾著；李瑞林等譯：《閱讀的歷史》。上海：商務印書館，2009年。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著；王鎖英翻譯：《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十六世紀手稿》。澳門：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口：海南出版；北京：三環出版社，1998年。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鄭子瑜：《詩論與詩紀》。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

## (二) 論文

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輯，頁37—65。

朱寒：《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中國之旅》(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周亮：《清代越南燕行文獻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易惠莉：《中日知識界交流實錄——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話》，《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6期。

河宇鳳：《重新發現的日本使行錄——與〈海行總載〉的補充相關》，《歷史學報》，1986年第112期。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南國學術》，2015年第1期。

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文學遺產》，2008年第1期，頁114—131。

張京華：《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為中心》，《外國文學評論》，2012年第1期，頁5—44。

葉楊曦：《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載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編：《中國學論叢》，2008年第24輯。

劉玉才：《清初渡海移民與中日文化認知——以〈張斐筆語〉、〈霞池省庵手簡〉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47卷。

魏麗莎：《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述略》，《文獻》，2011年第3期，頁144—150。

## 二、日文

### (一) 專書

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關係史の研究》。東京：文獻出版，1986年。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上冊1965年、下冊1969年。

田中健夫：《中世海外交涉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年。

辛基秀、仲尾宏：《大系朝鮮通信使》。東京：明石書店，1994年。

岸野久著：《西歐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來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9年。

河野純德譯：《沙勿略全書簡》。東京：平凡社，1985年。

高橋博巳：《東亞の文芸共和國》。東京：新典社，2009年。

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年。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實藤惠秀翻譯：《大河内文書》。東京：平凡社，1964年。

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

## （二）論文

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2003年第42號，頁127—238。

高橋昌彦：《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錄稿（一）》，《福岡大學研究部論集》A人文科學編，2007年第6期卷8，總297期，頁17—35。

高橋昌彦：《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錄稿（二）》，《福岡大學研究部論集》A人文科學編，2009年第9期卷1，總306期，頁21—40。

## 三、韓文

### （一）專書

李元植：《朝鮮通信使》。首爾：民音社，1991年。

柳得恭：《雪岫外史》外二種。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

李慧淳：《朝鮮通信使的文學》。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6年。

具智賢：《癸未通信使使行文學研究》。首爾：寶庫社，2006年。

具智賢：《朝鮮後期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翻譯叢書》。首爾：寶庫社，2013年。

金文京：《萍遇錄》。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2013年。

金泰俊：《洪大容與其所處的時代》。首爾：一志社，1982年。

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

趙奎翼：《朝鮮通信使使行錄研究叢書》。首爾：學古房，2008年。

韓泰文：《李彥瑱的文學觀和通信使的世界認識》。釜山：釜山大學校國語國文科，1997年。

蘇在英：《旅行和體驗的文學：中國篇》。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5年。

姜在彥：《朝鮮通信使的日本見聞錄》，한길사，2005年。

## (二) 論文

朴香蘭：《〈熱河日記〉筆談中捕捉到的清朝文人的形象和意義》，《東方漢文學》，2009年第39期。

김철：《通過〈筆談〉看申翠微和清代文人交流的樣態及學術傾向》，《亞細亞文化研究》，2009年第16期。

李學堂：《燕巖〈熱河日記〉筆談內容的考察》，《亞細亞文化研究》，2008年第15期。

마즈우라아키라：《近世東亞海域中國船的漂着筆談記錄》，《東亞細亞文化研究》，2009年第45期。

張存武：《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載入崔永禧先生華甲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韓國史學論叢》。首爾：探求堂，1992年。

송원찬：《清代韓中文化交流的文字獄——以〈乾淨衎會友錄〉為中心》，《東亞細亞文化研究》，2010年第46期。

오인택：《崔溥〈漂海錄〉中出現的筆談》，《歷史與世界》，2013年第44期。

정훈식：《〈乾淨衎筆談〉和使行文學的轉換》，《배달말》，2002年第31期。

權政媛：《朝鮮後期韓中文化交流之一樣態：以筆談為中心》，《漢字漢文教育》，2003年第11期。

##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cholarship on “Brush Talks” of East Asian Literati**

**ZHANG Bowei**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efor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East Asian area was a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One important indicator is the fact that all the intellectuals of this cultural circle could use Chinese characters to write and to communicate. And, they took pride in it. When the literati of East Asia communicated face to face, a special means was employed, namely “brush talk.” The term “brush talk” literally mean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riting brush rather than the tongue, with characters rather than language. In a narrow sense, it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conducted via the written language instead of spoken language at a meeting between people from two or more countries who share a common writing form but differ in speaking. The present essay discusses “brush talk” in its narrow sense. The period of its discussion is no later tha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reviews and evaluates the documented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of “brush talks.”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th our scholarly prospects and emphasize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as a method.”

**Keywords:** East Asia, literati, “brush talks,” retrospect, prospect